

大革命失败后唯物史观的 “革命化”阐释与运用

金 梦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实践基础,也有理论支撑。大革命失败后,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呈现出革命化的特点。这种新的阐释趋向通过唯物史观阐释学人的学术活动与理论成果,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毛泽东将这些思想观点内化,立足中国实际,形成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关键词: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新民主主义革命

DOI:10.13658/j.cnki.sar.2021.02.004

作者简介:金梦,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1)2-0027-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革命运动。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了一场“知识革命”。所谓“知识革命”,一是指唯物史观为探寻未来道路的国人提供了一种“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颠覆了以往片面地从文化、政治、科技等角度试图改良社会的路径;二是指,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体系所指导的新型革命运动被带到了中国,即有理论根据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出现了,这是与之前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不同。抛却这种“知识”的重要性,就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因此,若要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仅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维度考察,理论维度同样不可或缺。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27—1937年唯物史观论研究”(项目编号:19YJC710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8NTSS18)。

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①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从而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到底学到了怎样的唯物史观理论?这一理论又是如何在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与发展,进而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构建的?对此,我们有必要回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历程。有一个时间点很关键,即1927年。虽然唯物史观在“五四”时期的第一次传播热潮促使不少先进分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但真正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显著和主流的趋势则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是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作为革命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逆势而上,成为“30年代的主干思潮”,掀起了第二次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依据现实和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反思了早期研究之不足,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使其呈现出新面貌。从此,唯物史观更加深入、广泛地塑造着国人关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观念,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革命道路的思考。

一、唯物史观阐释的“革命化”趋向

从“五四”时期学人阐释来看,唯物史观被称作“经济史观”。^②这种认知常使人们过多注重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甚至将社会变革寄希望于生产力的自然演进,而忽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因此蒙上了“机械论”“定命论”的色彩。反对者借此攻击唯物史观“以为人类全为物质环境左右……随其所遇而毫无意志选择之自由,实不啻为一种‘经济定命论’,而陷于哲学上之所谓‘命运论’”。^③这样的唯物史观显然无法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提供指导和理论支撑。对此,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曾试图撇清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的关系,改变其机械面貌。但由于当时唯物辩证法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故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占了主流。

直至大革命失败后,伴随着新的唯物史观阐释主力的形成与壮大,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其中,主体力量的生成是唯物史观得以呈现新面貌并影响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构建的关键条件。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诉求,以及一些国民党人、自由主义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猛烈抨击,更多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反思研究不足、深入研究唯物史观彰显理论价值之必要,遂形成了以李达、艾思奇、吴亮平、翦伯赞、张如心、沈志远、彭康等为代表的唯物史观阐释主力。与早期研究者基本兼具革命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革命家从主体中抽离,专心于革命实践,阐释重任则主要由学者承担。这也使得唯物史观理论探讨更具深度和学术性。这一主力群体是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中期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其特点在于:一是他们几乎都有留学背景,并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有极高理论造诣。其中,留学日本的有李达、艾思奇、彭康等,留学苏联的有张如心、吴亮平、沈志远,翦伯赞则有留学美国背景。他们都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回国,将日本和苏联等国外学界的阐释观点以及理论分歧带到国内,影响着国内思想界。同时,他们承担了马

^①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

^②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页。这种看法是受到日本学者河上肇与美国学者塞利格曼的影响。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新史观是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观察社会变迁,故称其为“经济史观”。

^③ 肖纯锦:《马克思学说及其批评》,《学衡》1922年第2期。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主要译介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还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积极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二是这些学者掌握了重新阐释唯物史观的理论工具——唯物辩证法。1930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由日本转向苏俄以及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得以广泛传播。李达、沈志远、吴亮平、张如心等学者不仅积极译介唯物辩证法经典著作,还撰写了相关研究论著。他们对唯物辩证法有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为改变唯物史观的机械面貌提供了可能。三是这些成员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他们既将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方法,也视其为一种改造社会的世界观,认同唯物史观所指向的革命手段和未来道路,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实践。

他们撰写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以澄清他人的误解,深入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代表作包括: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吴亮平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①以及张如心的《无产阶级底哲学》等。艾思奇、沈志远、翦伯赞、彭康等还以《新思潮》《社会科学战线》《读书生活》《文化批判》《学术界》《生活周刊》等左翼期刊为阵地发表文章,阐明主张。正是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得以呈现新面貌,为更多人所信服和欢迎。

那么,这些学者对唯物史观到底有着怎样的新认知呢?由于此时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到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价值,他们将其当作一种“革命逻辑”,^②认为唯物史观只有借助于此才能赋予社会历史发展以革命性,故而特别强调唯物史观的“根柢是辩证法的唯物论”。由此,在判定其基本性质时,唯物史观便不再是机械的经济史观,而是对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把握。^③在这种新的定性之下,其基本理论命题也呈现出新面貌。

第一,在阐释社会基本矛盾时,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注重人力对这两者的主动变革。一方面,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中,不再将生产力等同于生产工具或生产技术,而是突出劳动者因素为生产力构成的核心。早期不少学者相信生产力是纯属技术的观念,而忽略人的支配因素。这种离开主体的历史观将历史看成自然演进的过程。对此,学者强调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三种要素的统一体。^④劳动者是其中“最根本”的要素。^⑤

进而,学者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沈志远指出,虽然生产力具有优越性,但生产关系绝不是生产力之受动的反映,一定的生产关系能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⑥故而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陈伯达曾谈到,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的精髓,就是对立的矛盾之争斗,乃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在社会历史范围内,同样遇到这个不可抵抗的辩证法。社会历史内部的根本矛盾乃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所引出的社会阶级之矛盾和争斗。在阶级社会里,阶级之矛盾

① 吴亮平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在1930年由上海心弦出版社出版,该书被称作“最好的唯物史观教本”。这本书原本由芬格尔特和薛尔文特合著,于1929年冬天在苏联出版。中文本由吴亮平编译而成,虽不能算作吴亮平的原作,但其在前言中说明,“编者对于原书增删修改之处颇多”,“不拘原文字句”,所以他谓“不敢言译,只能说‘编’”。这本书间接反映了吴亮平个人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

② 张如心:《无产阶级底哲学》,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103页。

③ 彭康:《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文化批判》1928年第5号。

④ 李达:《社会学大纲》,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5年,第308页。

⑤ 林为梁:《唯物史观研究大纲》,《学术界》1937年第2卷第2—3期,第68—69页。

⑥ 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1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年,第334页。

和争斗成了历史运动的动力。^①

这些观点启示时人,若想实现社会的变革,应主动通过人力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那么,由谁来实现这一变革呢?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劳动者就要为生产力发展的利益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与全社会利益相适应的,只有无产阶级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克服了,才能保障生产力的向前发展。^②由此,揭示了阶级斗争之必然性与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阐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强调后者的能动反作用。早期学者对上层建筑的认识比较模糊,也没有重视其反作用;进而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为时过早,“鸡雏”还没有长大,还不到破壳而出的时候。^③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他充分阐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但另一方面,上层建筑“不单是受动的社会现象;两者互生作用,并影响于经济构造的发展而成为能动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④

第二,突出“动的逻辑”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特征。一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说明社会历史是处在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彭康指出,历史的“动的逻辑”,“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了”。^⑤而这不断变动的原理在于矛盾统一律。正所谓“一个变革的时代……要从物质的生活底矛盾,从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现存的冲突去说明。有这样关系的历史是进展的,它决不会停滞,其进展的过程是辩证法的过程”。^⑥学者们还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说明整个世界一直处在生成—发展—消灭的运动中。质量互变规律则被用作去论证主动实行革命以促进社会突变的必要性。他们不再强调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渐变即量变,而是强调由旧社会形态向新社会形态的突变即质变,否认了进化论者所谓“无飞跃”一说。上述阐释的作用体现在使人们相信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永恒的,现存社会注定是不合理的,是要灭亡的。通过“渐次地斗争,终于将它排除,而促进一种完全与它不同的新的制度。这便是唯物史观”。^⑦

二是在承认社会发展“动的逻辑”基础上,强调“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各国社会发展的普适法则。在社会史论战中,当时一些国民党改组派和自由主义学者以中国国情特殊而质疑马克思社会形态说的适用性。但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五种社会形态论”。早期学者对历史的分期看法:一是划分标准不一致,二是对各个社会形态的认知也不同。1930年代,“五种社会形态说”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占据了主导。如李达、林为梁等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普通历史研究者都把人类社会历史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的构成态、古代的(奴隶所有者的)构成态、封建的构成态、资本主义的构成态、社会主义的构成态。^⑧

马克思主义学者突出强调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适性,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曾解释:“自大革命以来中国革命尖锐化。于是中国部分的买办历史学者,企

① 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4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年,第189页。

② 吴亮平:《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上海心弦出版社1930年版,第168页。

③ 范寿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1921年1月。

④ 李达:《社会学大纲》,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5年,第215页。

⑤⑥⑦ 彭康:《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文化批判》1928年第5号。

⑧ 林为梁:《唯物史观研究大纲》,《学术界》1937年第2卷第2—3期,第65页。

图维持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旧有的统治地位,害怕国际革命理论影响到中国民众,害怕中国的解放会影响到他们阶级的没落,于是在历史上曲解中国为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无阶级的‘士大夫社会’等。他们说,中国两千年来就没有封建势力,中国是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或商业资本统治着。为要批判这些误解,并展开正确的现实斗争,因此,历史科学的研究在今日这个伟大的现实斗争的时代,实为必要。”^①

总之,面对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辩证法改变了以往对唯物史观的机械认识,从辩证的角度凸显了社会基本矛盾诸要素的能动性、社会发展规律的“动的逻辑”及其普适性,凸显了唯物史观的能动性与革命性。这种革命化阐释趋向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构建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理论阐释主力与延安时期毛泽东唯物史观思想形成的关系考察

正当国统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多场唯物史观大论战的时候,共产党人却因忙于土地革命和长征,无暇顾及理论研究。再加上国民党人严厉的文化围剿,使得有关唯物史观的思想观点无法立即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但是1935年10月,当中国共产党落脚陕北,特别是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包括艾思奇、吴亮平、张如心、何干之等人在内的一批曾经担当唯物史观理论阐释主力的学者纷纷奔赴根据地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带去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们中不少人都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活动交集。例如艾思奇于1937年10月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等职。其间,他与毛泽东有着频繁的学术交流。艾思奇初到延安时,毛泽东曾致信夸赞其《哲学与生活》一书使其“得益很多”,送去抄录稿并提出自己的疑问,称“详情当面告诉”。^②1938年1月,毛泽东又因梁漱溟的《乡村运动理论》中的理论问题,致信邀请艾思奇“有空可来谈”。^③通过信的内容分析,毛泽东是在回应艾思奇之前提出的某些问题,可见艾思奇与毛泽东私下是有多次接触的。同时,艾思奇在延安中央研究小组等公开场合具体指导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毛泽东还多次与艾思奇共同参与新哲学会与哲学研究会的讨论活动。再如张如心、吴亮平都曾是国统区唯物史观阐释的理论战将,翻译过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二人之后都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其后在多个院校担任教职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对吴亮平是十分信任与器重的。早在1931年,毛泽东率军攻下福建漳州时,曾获得吴亮平于1930年翻译的《反杜林论》这一战利品,一直带在身边学习。此后还多次邀请吴亮平去住处谈论《反杜林论》的理论问题。吴亮平不仅积极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在陕北公学、抗大、马列学院与中央党校讲授马克思主义,是延安最主要的教员之一,并负责马列主义研究会的日常学习活动。张如心到延安后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并积极阐释毛泽东的思想。此外,艾思奇、张如心、吴亮平、何干之还都是延安新哲学会的发起人,他们经常与毛泽东一起讨论理论问题。可见,这些唯物史观阐释主将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与毛泽东有多次的学术交流,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思考势必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影响。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9年版,第1页。

^{②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118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还曾有意识地积极搜集与阅读当时出版的唯物史观的相关理论著作。早在1936年10月,毛泽东便曾托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①1941年9月,毛泽东向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同志推荐了由艾思奇和郑易里翻译的米丁等人的著作《新哲学大纲》、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所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及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的“序说”。^②1943年12月,毛泽东曾托胡乔木在延安尽力搜集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的书籍,强调不论是翻译的或者写作的都要搜集。^③同月,他还推荐刘少奇阅读1930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从猿到人》及郭列夫《唯物史观的哲学》,并称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④可见,毛泽东是非常渴求学习唯物史观,并希望中共其他干部都能学习,而学习的书籍多是二三十年代的唯物史观经典论著。

特别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李达在1937年5月该书出版后,即寄送一本给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曾说:“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⑤他又把这本书推荐给新哲学学会和抗大的同志,并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都来阅读这本书。他称赞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⑥毛泽东是在1938年1月17日到3月16日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阅读了这本书,在书中他做了大量的批注。据学者石仲泉统计,这本书相当多的部分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两遍,写了大约3400字的批注。^⑦从毛泽东的读书日记看,他阅读了该书的全部内容,对其中最重要的三篇,即第一篇《唯物辩证法》的大部分内容、第二篇《当做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以及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的一部分做了批注。从标注中能够看到毛泽东受李达思想影响的诸多印记。在开篇,李达指出其研究社会法则的目的在于“基于被暴露的法则,指示实践的方法,以促成由一种社会有机体进到别种高级社会有机体的变革”。其中,毛泽东在“指示实践的方法”“促成”“变革”诸词下画了横线,尤其是对“变革”一词做了重点的符号。毛泽东针对这段话在旁边注解道:“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⑧可见,他学习这本哲学著作是抱着改造社会、将理论运用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的目的而阅读的。

具体来讲,毛泽东在阅读中关注并接受了该书的以下观点:第一,将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唯一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在该书第一篇《唯物辩证法》的第一章《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中,特地标注出“社会学的唯一的科学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是把社会当作不断的发展着的、生动的有机体解释的”这句话,并把“唯一的”做了重点标记。进而他认为社会就是“发展的有机体”,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的唯物史观是对“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法则之研究”。^⑨毛泽东还对第一篇中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做了诸多标注,强调“矛盾即运动”,“要承认飞跃律的普遍性”,认为这些唯物辩证法的法则即反映物质的永远运动和发展的法则是普遍存

①②③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0、189、217、219页。

⑤ 郭化若:《郭化若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页。

⑥ 《陶德麟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8页。

⑦ 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⑧⑨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210、209页。

在的。^①

第二,反对关于社会历史宿命论看法,主张实践的能动性。毛泽东在“可能性与现实性”问题上,重点标注了李达批判宿命论者的“自然生长论”的论述。在宿命论者看来,可能性到现实性转变是必然的过程,劳动阶级的解放也是历史必然,人们当然也没有组织要求解放的党派的必要。毛泽东和李达一样反对这种说法。^②毛泽东特别看重实践的作用,他在“社会的实践,是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变的重要的契机”一句中将“社会的实践”“重要的契机”重点做了标注,并用抗日战争、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的事例来分析这些哲学原理。可见,他已经在试图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寻找理论基础了。

第三,接受了李达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毛泽东不仅对李达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释有标注,而且重点关注了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中《生产力的社会性》一节。他标注了李达解释“劳动手段,虽是社会诸关系的指示器,却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一段话。^③同时,毛泽东特意标出了该书讲意识形态反作用的论述,并注“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④这说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了。此外,毛泽东还关注了该书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容。

除阅读中国学者的著作外,毛泽东还阅读了两本20世纪30年代国统区十分流行的苏联唯物史观经典著作,它们都曾对中国学者的唯物史观阐释产生过关键影响,也都由李达、沈志远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翻译。译著包括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的第三版与第四版及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间阅读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内容。从批注来看,他认为,“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要素”(原批注如此,“马克思”指“马克思”)。^⑤毛泽东还结合中国现实指出,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都是犯了不运用辩证法的错误。^⑥毛泽东在阅读对立统一的矛盾问题时,表达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规定社会的发展的意思。^⑦他特别重视质量互变法则的内容中关于“飞跃”的阐述,表示“承认飞跃的发展,是辩证唯物论的中心特点之一”,“自然、社会、思维都有飞跃”。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通过革命而显现的”一句,他将“革命”一词做了重点符号。^⑧1937年7月前,毛泽东阅读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重点批注了第三章“辩证唯物论”的内容。他赞同该书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达到的最大的胜利,就是他们把唯物论的认识运用到人类社会上去……开拓社会生活底真理,揭露它底深刻的矛盾和推动的力量”,毛泽东称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社会观”。^⑨其在后文的相关内容旁还标注了“辩证法的进化观”一语。^⑩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唯物史观看作辩证唯物的历史观了。

总之,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唯物史观的思想观点正是通过上述几种方式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思想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学习与交流,毛泽东此时已经意识到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的历史观。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下,他认识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并为革命问题找到了理论支撑。毛泽东将这些思想观点内化,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40—260、263—264、275、210、14、9、67、59—60、150、158页。

三、“革命化”阐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运用与当代启示

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找到理论依据,树立了革命的合法性。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最终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运用这一原理具体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1948年2月,毛泽东为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所起草的文件中明确引用了唯物史观的理论表述。该文首先分别详细解释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并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即当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枷锁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他指出,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政治、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政治、精神的新的建筑物。^①

毛泽东十分注重上层建筑的变革问题。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了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必要性。他认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需要发展工业。但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一切都依赖外国,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所以,要想“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②

第二,中国共产党依据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说,立足中国实际,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确立了革命的性质、目标与阶段。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遵循一般规律。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③毛泽东结合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明确界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他强调,中国社会是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但“只是因为外部和内部的原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④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⑤

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和社会形态说重点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民主主义阶段,要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这个阶段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社会。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⑥毛泽东依据社会形态说解释道:“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只

①④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③⑤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626、668页。

是空想。^①他进而批判了“二次革命论”，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亦即说，虽然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但社会主义革命却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②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合法性，以及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阶段的论述，处处闪烁着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与社会形态说的理论光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为指导，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指向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蓝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他重点指出，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为党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指南。^③应该说，唯物史观在当今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唯物史观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诘难。一些学者质疑唯物史观不再能有效解释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呼吁以新的方法论重新认识过往的历史和未来的道路。这种质疑一部分来自正常的学理论争，另一部分则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暗流涌动，其本质上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否认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合法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与影响，其现实启示在于：第一，由于唯物史观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及其所特有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双重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第二，必须加强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力度，提高研究和宣传水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人们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具体分析的能力仍显不足，这也是一些人质疑唯物史观当代价值的原因之一。因而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理论，以保持唯物史观的旺盛生命力。第三，注重不同思想的交流与对话，推进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回望历史，每一次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与创新都离不开思想的交锋、互动。在坚决批判错误认识的同时，我们应该欢迎这种思想交锋，闭门造车只能导致理论的衰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思想互动中发展和创新，才能永葆理论之树常青。

〔责任编辑：李欣〕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

③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